

# 评目前人文精神研究工作的几种不良倾向

黄菊屏<sup>1</sup>, 陈湘舸<sup>2</sup>

(1. 浙江大学 玉泉校区图书馆; 2. 浙江大学 玉泉校区中文系, 浙江 杭州 310027)

**【摘要】**本文评述了目前人文精神研究工作中存在的几种不良倾向,如过高估价人文精神的作用,反科学主义,排斥与疏远马克思主义以及知识分子化这四种有代表性的倾向。文章指出,这几种倾向对于人文精神自身的重建与发展,对于人文精神在人类社会进步中所应发挥的作用,都将产生不良影响,有必要予以纠正。文章重点剖析了“唯人文主义”思潮和把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化的观点,提出科学人文主义的命题,并主张把人文精神马克思主义化、大众化。

**【关键词】**人文精神;不良倾向;科学化;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1999)04-0077-07

## On the Harmful Trends in Humanistic Spirit Studies

HUANG Juping<sup>1</sup>, CHEN Xiangge<sup>2</sup>

(1. Yu Quan Campus Library, Zhejiang University; 2.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esent humanistic spirit studies, there are four typical harmful trends: to overrate the work of the humanistic spirit, to be anti-scientific, to reject and deviate from Marxism and to be intellectualized. These trends are harmful to the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istic spirit. This essay analyses humanistic thoughts, proposes the idea of a scientific humanism, and suggests a combination of the humanistic spirit with Marxism in a larger sense of popularization.

**Key words:** humanistic spirit; harmful trends; scientism; popularization

近些年,我国人文学界不少学者再三强调指出,在改革开放和实现现代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需要加强对于人文主义的研究,重建人文精神。应当说,这是必要的。因为现代化、科学化的人文精神,对于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及我国改革开放的继续推进,的确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但是,国内外一些学者在对于人文精神的历史作用的评价、人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种种不良倾向,甚至是错误的认识。为了人文精神的重建和发展,为了更好地发挥人文精神应起的积极作用,有必要澄清有关错误认识,克服和纠正研究工作中的不良倾向,并肃清它的影响。

## 一、过高地估价人文精神的作用

在过去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自然科学界及实际工作部门的一些人片面宣扬科学技术的作用,信奉科学万能,陷入了唯科学主义的误区。但近些年来,社会科学界一些人与之相反,走向另一个

**【收稿日期】**1999-04-07

**【作者简介】**黄菊屏(1956-),女,湖南省洞口县人,浙江大学人文图书馆馆员,主要从事人文精神与社科信息研究;陈湘舸(1948-),男,浙江人,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人文精神建设方面的研究。

极端,过分夸大人文精神的作用,又陷入了唯人文主义的理论误区。这主要表现在一些学者宣称,人类社会目前存在的生态危机、精神危机、道德危机及核战争威胁等问题,只要通过重建人文精神,加强人文精神的宣传与教育,提高人们的人文修养,就可望解决。西方有些学者认为,目前各种社会危机的存在与加剧,主要原因是由于大学丧失了昔日的优良传统,抛弃了理性沉思和社会批判的理想,完全为社会的功利所虏,无原则地屈从于经济、科技和市场的需要,变成它们的工具的缘故。因此,他们试图通过整顿大学教育方针的办法来根治、克服上述危机,解决好诸种棘手的社会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呼吁改变现代大学制度,恢复大学传统。所谓的大学传统,是指中世纪以来西方古典大学一直奉行的人文主义和博雅教育之理想精神。企望通过这种途径,在大学中复兴人文理性,造就既有科学知识、又有人文精神和至善品格修养的“完人”,以此来救治危机重重的西方世界。

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他提出一种自认为理想的大学模式:大学应该自治,要独立于社会之外,保持价值中立,不受社会政治和市场的左右。大学为社会服务是通过为社会培养有道德、有教养的“完人”,并且通过传播和发展学术思想的方式引导社会朝着符合人的解放的方向前进。而韩国著名的教育家、人类学学者赵永植在他的名著《重建人类社会》中,更加明确而郑重地提出:“今天,所有的大学正面临着全世界规模的人类现代危机和难题,需要的是采取统一的行动,大学如果不能为人类找到一条生路指给人们,能说完成了自己的本来使命吗?建构现实的而非空理论的人类社会理想模式,正是当今大学人的使命。”<sup>[1]</sup>而现代大学怎样去完成建构“人类社会理想模式”的使命呢?赵永植认为,在人本思想的基础上,通过人文主义、和平主义的教育,使青年一代成为具有“广博的知识和教养,作派和价值两追求”的“全人”,即“完人”。当由“全人”来主宰未来世界,他所祈望的“充满人本主义精神的人类社会”就会来临。赵永植同赫钦斯可称是虔诚的“教育救世说”或“教育创世说”者。但究其根本,实际上是“人本主义救世说”者。因为他们是试图在通过教育复兴人文理性,以解决现代化社会面临的危机。而我国的一些人文学者亦信奉“人文主义救世说”,有学者在题为《人文视野中的现代科学技术》的讲演中就呼吁说:“在科技的第N次浪潮之后,在数字化生存的今天,苦海茫茫,我们希冀,风从大自然吹来,视野中驶来人文精神——地球最后的诺亚方舟。”<sup>[2]</sup>这位学者把人文精神视为能够挽救人类脱离现代化进程产生的生态、道德、信仰危机和核威胁等苦难的“诺亚方舟”。

上面诸种过分夸大人文精神作用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其理由如下:

其一,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反人文主义的经济、政治势力。因此,力图在资本主义国家复兴人文理性以拯救人类,这只能是善良的愿望而已。西方国家资产阶级在17世纪、18世纪作为新兴的革命阶级,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其代表人物曾经高举着人文主义的旗帜,以为革命制造舆论和动员人们投入反封建斗争。但是,当资本主义革命完成之后,资产阶级便由革命阶级变为反革命的阶级,尤其是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之后,成为国际上一切反动势力的总代表。资产阶级“告别”了革命,也便从根本上“告别”了人文主义,放弃了人文精神的基本原则和宗旨。而到了今天这种自动化、现代化时代,资产阶级更是彻底抛弃了人文主义。当然,这并不排除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及其政府还不时地唱一些要尊重人文精神的调子,但那只是一种幌子,是政治上的需要而已,与他们实际生活中所作所为是完全两样的。对此,资本主义国家一些有良知的学者也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揭露与批判。如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在其名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颇为中肯地指出,资本主义历经了二百余年的发展和演变,已经形成它在经济、政治与文化三大领域间的根本性对立冲突,导致“资本主义精神的裂变”。在经济领域,经济效益最大化原则使它“发育成一个以严密等级制、精细分工制为特征的自律体系”,从而使社会成为一个“日趋非人化的体系,人的丰满个性被压榨成单薄无情的分工角色”<sup>[3]</sup>。也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而另外一位学者则更为明确地指出,综观近现代世界史,“更大规模的反人文主义运动,可以从欧洲各国的帝国主义

势力膨胀中看到踪影”<sup>[4]</sup>。他还分析说,在资本主义企业的财富分配方面,“某些阶层的人被忽视,他们的生活依然非常悲惨。也就是说,在产业生产量的扩大方面投入了最高价值的资本家,完全忘掉了作为近代精神之母的人文精神,只忙于赚钱”<sup>[5]</sup>。

既然资本主义国家所存在的日益严重的生态、道德、信仰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经济及政治制度,也就是说由于它的经济、政治制度在本质上是反人文主义的结果,那么,毫无疑问,要想复兴人文理性,重建人类精神,这就决定了首先必须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由此看来,西方国家的大学之所以放弃了人文主义、博雅教育的优良传统,并不是因为哪一个教育家、大学校长的指导思想出了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使然,不得不那样。因此,力图恢复大学教育的人文主义传统,也是徒劳的。西方大学不可能超越阶级利益与市场经济而保持中立,为全人类服务,去实现人文目标。同样的道理,西方一些人文学者提出的这种设想也是空想。他们试图在现有的社会制度下,让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重新结合起来,就是用人文精神去指导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利用。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消除生态、道德、信仰等方面的危机。因为在他们看来,之所以人类社会会出现上述危机,根本原因是由于科学与人文分裂的缘故。但是,科学与人文发生分裂的根源却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因此,只有消除资本主义制度,才有可能让科学与人文很好地结合起来。否则,这也只能是纸上谈兵。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尽管西方的人文学者在近几年来一直致力于人文精神的宣传,呼吁重建人文精神,但与他们的愿望相反,人类社会日益向着与人文主义相对立的方向发展。事实是最好的老师,也许他们迟早会清醒过来。

其二,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且已经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大量事实所反复证明。我们在分析和确认人文精神的作用时,应当以这一科学原理为指导。

由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若要想从根本上促成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与信仰等社会意识的改善,就必须从改变他们所处的社会条件入手。当社会存在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之后,人们的意识形态自觉也好、不自觉也好,都将或迟或早地随之发生变化。反之,如果轻视对人们的社会存在条件的改变,那么,即使正面的思想教育怎么下功夫、出新招,也难以从根本上有效地推进人们的意识形态的改变。由此看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所产生和存在的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矛盾与危机,有着深远的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的原因。这个道理,上述西方的人文学者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了。既然如此,那么,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现存的社会危机,转变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使之符合人文精神原则,必须要触动和改造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舍此当没有其他有效的方法。当然,唯物史观同时也承认,人的意识对存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有一定的反作用,即对社会存在、经济制度、社会生活方式有这样那样的影响。但是,这种反作用与影响是有限的。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或者说完全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危机,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否则,在历史观上,就将滑到唯心主义的泥潭。而以这种历史观来指导人的历史活动,就将使人们陷入幻想,妨碍他们去探索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与方法。例如,要想让未来的人类社会变为安定、幸福、美好的新世界,的确需要造就一大批有高尚道德、崇高理想和奉献精神的“完人”。但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他们的意识,即道德和价值观念,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尔虞我诈、残酷竞争、金钱至上的市场经济生活中,即使对大学生及广大青少年进行人文精神、传统道德教育,也不可能把他们,至少不可能把他们的大多数培养成为有道德的“完人”。资本主义国家就有学者曾提出这种质疑:按理来说,“教育愈普及、愈发达,人类也应更完美、更善良、更有价值和意义,但现实是知识水平越高,人心却越恶,犯罪比例也越大,这又如何解释呢?”<sup>[6]</sup>殊不知,这正表明,存在决定意识是科学的原理。人文主义教育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社会存在、经济基础之上,不可能造就出高尚的“完人”。在这一严酷的事实面前,确实应当抛弃唯人文主义这种不切实际的概念。

## 二、反科学主义的倾向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一些人公开敌视科学技术,否认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人类社会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的积极作用。这种明显的反科学主义的倾向,在人文学界也有所表现。它是唯人文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

人文学界一些人之所以公开敌视科学技术,否认其积极作用,这是由于在他们看来,科学技术的进步,已成为人类文明的“癌变”,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的生存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他们例举说,科学技术所提供的高效率的生产手段,使人类得以对自然进行无限盘剥和超量榨取,长此以往,结果是造成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因为采用现代科技手段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预程度,已经超出了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阈值”<sup>[7]</sup>,致使生态平衡已不能像在传统生产方式下那样,被人为破坏后又能恢复起来。这些学者还指出,科学技术导致非人化,即机械化世界。他们分析说,曾经为人类的生产、生活的便利而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在进入 20 世纪后,逐渐增殖自己,依靠自己的本能,脱离人的控制,自己任意地发展起来,改变了作为人类工具的地位,反而驱使人类,奴役人类。结果,使这个世界变成人的价值不如科学技术及其带来的物质产品的价值的世界。

反科学主义者往往还强调这一点,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日益丰裕的消费资料,结果使人成为十足的“消费工具”。他们说,日益丰饶的财富使人们物欲横流、纵情享乐,把他们引导到消费至上的歧途。结果,使人们把占有和消费大量的、高档的物质产品看成是人生的全部目的与价值。从而成为只有物质追求,没有精神追求的“消费动物”,与其他生物无异。

由于这些学者把上述问题的根源归结为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这样,他们对于科学技术进行口诛笔伐也就不奇怪了。我国人文学界对于科学技术的批判也很激烈,不亚于国外同行。如我国有学者悔恨百年前,我们的前人不该抛弃那“可爱而不可信”的人文主义,去信奉西方的“可信而不可爱”的科学主义。结果打开了加速人类走向毁灭的“潘多拉之匣”,并且质问道:“曾被古人斥为奇技淫巧的工业化、科技浪潮,到底给地球,给人类带来了什么?”<sup>[8]</sup>“科学技术难道不可以说是第一破坏力吗?”<sup>[9]</sup>还有一位学者则尖锐地指出:“西方文明中的技术侵略和扩张像个疯狂的漩涡,整个世界都被晕头转向地卷进去了。不再有家园,只有居室;不再问美与不美,只有所谓的先进与落后。大地为什么不起来和这世界争执?”<sup>[10]</sup>他们对于科学技术的敌视情绪溢于言表,十分欣赏古代男耕女织的手工生产和生活方式,高唱田园牧歌以抵制隆隆机声。

的确,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它所推动的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上述不正常的现象,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但是,应当说,科学技术本身是无罪的,与上述问题、灾难性的后果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实际上,这些问题和后果的发生变得日益令人难以容忍,根本原因是由于人们开发利用科学技术的目的、方式与程度不当。例如,核科学既可以用于生产和生活,造福于人类,当然也可以用于制造大规模的杀人武器原子弹。后者就是使用的目的与手段不当了。又如人们利用功能巨大的机械力去大量毁林开荒,或者兴办“三废”工厂而不治理污染,亦或人们利用科技带来的丰富物质进行浪费型高消费,导致物欲横流,一味追求物质享受。这是利用的方式与程度不当。而人类开发利用科学技术的目的、手段、方式和程度不当及欠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主要是由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的制度安排不当。例如,在工业革命之后,由于资本家采用机器织机而解雇了部分工人,发生工人仇视机器,砸毁机器的现象。但是,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这实际上并不是机器排斥工人,夺工人的饭碗,而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本来,采用机器生产可以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减轻劳动强度,改善劳动条件。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由于剩余价值规律和市

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原则的要求,结果发生机器排挤工人,工人丢了“饭碗”的现象。总之,是由于机器成了资本家获取更多利润的工具和手段。所以,不能把工业化、现代化后出现的社会危机与消极后果,归罪于科学技术本身,从而对它采取敌视态度。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经济还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还需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充分利用这个“第一生产力”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因此,我们应当否认这种反科学主义的错误思潮,纠正人文研究中的这种不良倾向。

### 三、排斥与疏远马克思主义的倾向

排斥与疏远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在一些有关人文精神研究的论著中,在有的人文学科学工作者的言谈中,往往或明或暗、自觉不自觉地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试图用人文精神取代马克思主义;二是试图摆脱马克思主义对人文主义的指导。关于前者,如人文学界有人指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中国哲学,能够给当今中国和世界的文化、精神危机“开出一条最好的解放道路来”<sup>[11]</sup>。在他们看来,“孔孟之道历来被人们认为是一种政治—伦理哲学,它可以成为我们重建道德秩序的精神支柱。”<sup>[12]</sup>用孔孟之道来做精神支柱、立国之本,似属欠妥。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精神支柱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至于后者,则主要表现在试图把人文主义非意识形态化,把人文精神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文化“分家”,试图以此种方法让人文主义摆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种观点也有一定代表性。

但是,马克思曾明确地指出:“每一个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史赖以确立的基础。”他还强调说,在每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此,人文精神就其主体和基本思想来说,不能不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并且必定是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意味着,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文精神应当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文化体系。

为了深入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文化体系包容人文精神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在此还有必要指出,人文精神并不是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专利”,而是一切革命的、进步的阶级共同拥有的东西。当然,不同时代和各个阶级的人文精神有不同的特点与形式,他们宣传人文主义的目的也不同,但是,一切革命、进步的阶级,或者说当某些阶级在具有革命性和进步性时期,它们各自拥有的人文主义都一致表现为对人类命运和幸福的关怀;对人的价值、尊严和力量的赞许与肯定,对人的地位、作用的重视,对人的本性和人格的维护,并倡导人的自由发展。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者也同样是提倡这些人文主义原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以及其他许多著作中,都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让每个人都得到解放、得到自由发展的社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未来的社会制度,也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对于广大劳动群众来说,那是“最无愧于和符合他们的人类本性”<sup>[13]</sup>的社会生产方式。而在《论土地国有化》这篇著名的文献中,马克思还把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看做是19世纪经济所追求的“人道目标”<sup>[14]</sup>。但是,需要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人文主义是革命的、科学的人文主义。它与过去的一切人文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者把人文主义原则、观念与目标置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予以彻底改造。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文原则、观念与目标,必须有适宜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为基础,有制度保障和支持方能实现。而这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所以说,不能把人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应当承认二者之间先天的、内在的联系,并进而承认人文主义原则、观念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精神文明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能把二者“分家”。

为了进一步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关系,对于人文学界那种试图把马克思

主义人文主义化的观点,有必要进行商榷。这也是人文主义研究中的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

近些年,人文学界有些学者指出,在未来社会,一方面,不能没有马克思;而另一方面,为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存与发展,它在今天不能不人文主义化。具体来讲,这些人认为,在科技、生产力高度发达、全球一体化日趋明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面临现代化和后现代化反省的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在摆脱了意识形态化传统之后,若不愿消解于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或民族主义,那么,批判与引导现代文明的人文文化理想主义,将是时代亟需并且依然不可逾越的一种定位。”<sup>[15]</sup>

在我们看来,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定位为“人文文化理想主义”,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将产生不良影响。首先,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般的人文主义思想,从而使它变为“一种超越性的人的本质观念”,这就不符合它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与规定。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确认,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它取决于人们具体所处的社会、经济关系和地位。这就决定了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本质具体表现为阶级性。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在阶级社会中,如果像人文主义者那样,谈论“超越性的人的本质”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其次,马克思主义是为无产阶级谋求解放的学说,是指导它进行推翻资本主义,代之以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时曾经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sup>[16]</sup>。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革命性。而从人文主义,尤其是当代西方人文主义者的理论来看,虽然他们也在不同程度,从不同角度上批判了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甚至提出要建立新的人类社会,但是,他们不主张以社会革命的方式去创建新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而是幻想以教育等方式去实现人文主义价值目标。他们不主张对现存的社会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造,力求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充满人文精神的新世界。因此,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化,混同于一般的人文主义,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变为一种对于工人阶级和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群众无益,而对旧世界和统治阶级则无害的东西。而这就适得其反。一些学者的本意是实行人文主义化,以此来“拯救”处于当今时代新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使它免于被“消解于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或民族主义”。而实际上,它同样没有摆脱被取消的命运。其三,当前,世界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原来以经济为中心到“以人中心”;同时在经历了新的科技革命之后,人类社会进入了新的信息社会,迈入知识经济时代。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后工业文明、后现代化对于人类自身的全面发展和个性解放,的确是“双刃剑”,利弊并存,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怎样才能正确地引导现代文明,使它去弊存利,彻底地消除对人类社会的消极影响,这是摆在思想界面前的不易回答的一个重大难题。事实已经表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理论,以及西方人文主义者的学说,都不能解决好这个问题。看来,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历史地落在了马克思主义肩上。因此,这就不应再把马克思主义定位于人文理想主义,把它降低到人文主义的水平。否则,它就担负不起“批判和引导现代文明”,使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历史重任。

我们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与之相反,应当进一步把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化、社会主义化。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改造它、完善它,加强对它的指导。与此同时,还要像马克思当年正确对待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哲学思想一样,注意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西方人文精神中吸取好的东西,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体系。

最后,我们来看看知识分子化倾向这一问题。

所谓人文精神,或者说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化”,是指把人文精神看成是知识分子独占、独享、独自追求的东西,是这个阶层或者社会集团的专有之物。它还包括一些人把在新的历史时期重建与振兴人文精神的目的,看成完全是为了知识分子的权益,只是为知识分子服务。

这种不良影响,在人文学界较为普遍且严重地存在着。例如,有学者十分看重、过分强调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属性,甚至说,“今天所需要的人文精神,可能只是知识分子话语的一个执著的世界,一个与当权者无关甚至在目前也可能是与民众没有多大关系的独立存在”<sup>[17]</sup>。他们解释说,之

所以如此,其主要原因是知识分子与其他社会群体不同,他们所依据的不是现实世界中个人或某一群体的利益,而是超越于各种具体利益之上的精神乌托邦立场。

我们还要指出,把人文精神看成是与“当权者”和“民众”无关,而为知识分子独有的一种文明,这是片面的,也不符合古往今来,尤其是今天的实际情况。本文前面曾指出,当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其处于上升时期,还是革命的、先进的阶级的时候,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都自觉不自觉地、或明或暗地主张和实行人文主义的原则。当然,由于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性和缺乏适宜的经济、政治制度的保障和支持,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人文精神的实行往往是短暂的、片面的,甚至具有浓厚的虚伪性。但毕竟不仅仅只有知识分子主张人文精神。而在今天,人文精神已成为时代的旗帜,实行人文原则,实现人文目标,不仅成为广大劳动群众,而且包括“当权者”在内的要求和心声。这突出表现在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明确指出的,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已进入“以人中心”的新阶段。这标志着人类已迈入人文主义时代的门槛。当然,前面的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

但是,为了彻底地实现人文目标、原则和价值观念,无疑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奋斗,因此,仅仅靠少数知识分子的作用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精神文明程度的提高与普及,社会上大多数的人将进一步认识到,建设人文精神,弘扬人文主义,不仅有利于维护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利益,而且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因此,他们将会与知识分子团结奋斗,努力建设一个充满人文精神的美好的新世界。而我们也希望并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将会深刻地认识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人文精神,真正实现人文原则与目标,藉此维护自己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利益,并且造福于广大群众与整个人类,必须与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奋斗,而不能只看到自身的力量。这是因为人文精神、人文目标与原则,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它的形成、发展、完善和巩固,需要相应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显然,人文精神所需的诸种社会条件,只有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和“当权者”们的支持,才能创造出来。因此,在新时期建设现代化的人文精神的进程中,知识分子不能只相信自己,或者只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孤军奋斗。所以,在今天,向广大干部与群众宣传人文精神,培养他们的人文观念,让人文主义大众化,从而使按照人文原则、观念办事,成为广大群众与干部的自觉行动,这当是知识分子的一项光荣任务,也是当务之急。总之,人文精神不应知识分子化,而应大众化。这才是人文精神的曙光,才可望建设一个充满人文精神的新世界。而这正是先进的、正直的知识分子们所梦寐以求的美好理想。

#### 【参 考 文 献】

- [1][4][5][6](韩)赵永植.重建人类社会[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186-187,54,67,3.
- [2][8][9]毛民.环保之心:地球居民最后的良知[J].佛教文化,1998,(5):31-32.
- [3]余萧枫.哲学人格[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229.
- [7]孔繁德军.生态保护[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
- [10]徐刚.星空夜话—关于人与大自然的断想[J].民主与科学,1998,(1).
- [11][12][17]司空奇.人文精神讨论综述[J].新华文摘,1997,(3):120-124.
- [1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26-927.
- [14][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54,443.
- [15]尤西林.人文学科与20世纪中国学术[J].学术月刊,1998,(7):50-56.

[责任编辑 徐 枫]